

关于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 几个问题的研究——基于原始史料的再议¹

Kampol Piyasirikul²

摘要

近几十年来，关于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可是对于蔡出任北大校长、蔡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以及关于五四后蔡的辞职等三个问题，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着分歧与争论。作者之前曾经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过梳理与综述，并发表过文章³，但尚未用到原始史料分析问题。为了使得蔡元培的这些相关问题研究得更加完善，作者在本文中尽量从原始史料的角度进行探讨分析与解答，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力求填补以往研究的缺欠与不足，有所创新。

关键词：蔡元培、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原始史料

¹ 本文章是作者在 2014 年 11 月 26-27 日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的“传承与展望：东南亚的中国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发表的同名学术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在研究本课题的过程中，有幸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 2014 年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第二期）（2014 年 9 月 4-20 日）。在此期间，作者有机会与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交谈，9 月 9 日-17 日还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进行了研修，与该中心的诸位汉学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这让作者开阔视野，受益匪浅，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作者还有机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收集相关材料，以及到蔡元培的北京故居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去参观，这一切对本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² 蔡炎通，泰国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比里·帕依荣国际学院中国研究专业教师。作者在上述会议上发表同名学术报告时为泰国皇太后大学（Mae Fah Luang University）汉学院教师。

³ 参阅蔡炎通. 2013. 《关于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汉学研究, (7), 第 172-193 页.

一、前言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蔡元培的研究确实能够使得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破有意义。而从泰国汉学研究的角度，中国学者对蔡元培的研究非常之多，几乎面面俱到，但在泰国却寥寥无几，很少人知道他。因此作者认为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向泰国人，尤其是泰国汉学家，介绍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位伟大人物——蔡元培，从而增进泰国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甚至能够引起泰国汉学家对蔡元培研究的关注，以便开拓泰国汉学界的新研究领域。

本文研究范围是五四运动发生前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下列三个问题：一、关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问题；二、关于蔡元培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三、关于蔡元培的辞职。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尽可能挖掘更多的新原始史料，以此分析与解答上述几个问题，试图使得蔡元培的这些相关问题研究得更加完善，力求填补以往研究的缺欠与不足，有所创新。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即首先必须设定研究目标与研究范围，然后再收集资料，尤其是原始材料。再者是对收集到的每份材料进行价值的评定与可靠性的分析。最后是谨慎而理性地将它们运用到本研究上，以解答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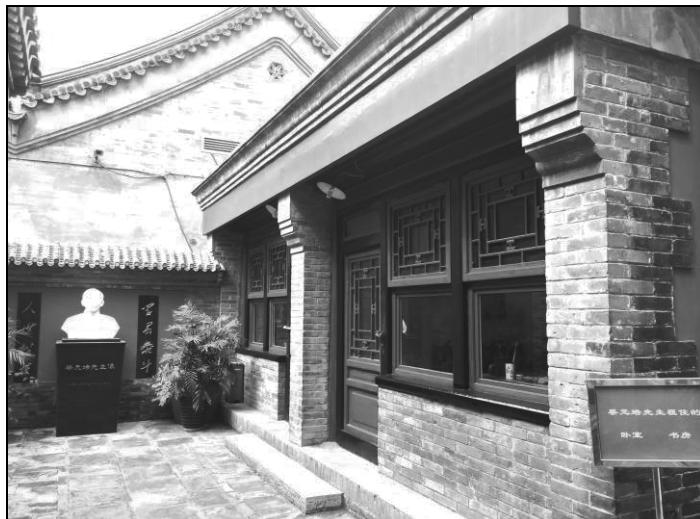


图 1：蔡元培北京故居
(图片来源：作者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在蔡元培北京故居拍摄)

二、就任北大校长之前的蔡元培的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 年 1 月 11 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他出身于翰林院编修。戊戌维新失败后，蔡元培对维新派持同情态度。他认为想要救国，首先必须培养人才。于是，他退出翰林，从事教育改革与革命救国活动。在 1902 到 1904 年的两年期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教育会会长、爱国学社总理、上海爱国女学总理和编译所所长等教育界职位。此时他还担任他与朋友们一起组织的《俄事警闻日报》（后改为《警钟日报》）的主编。1904 年冬，光复会成立，蔡元培被选举为会长。1905 年加入同盟会。1907 年 5 月赴

德国进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1911年底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初蔡元培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在任职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对全国教育进行了若干重要改革，如改订教育宗旨、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及在小学中实行男女同校等等。但由于蔡元培对袁世凯独裁政权感到十分不满，他于是年7月与同盟会其他三位总长一同辞职，退出内阁，不与袁世凯合作。在来自政治界的压力下，他被迫于是年冬再度赴德国学习和考察。1913年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召回国。是年7月办《公论晚报》呼吁讨袁，8月反袁军事失败。于是，9月他赴法国从事著译。1916年9月，蔡元培在法国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催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正式就任北大校长。



图 2：任北大校长期间的蔡元培

（图片来源：王世儒. 2010. 《蔡元培日记》（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三、关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问题

关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问题，学术界处于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蔡做出决定的动机在于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或授意，及二他自己所做决定，与孙中山毫无关系。持有第一种观点的学者有萧超然、高平叔和梁柱等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支持对蔡决定出任北大校长的影响重大。孙主张蔡北上就任北大校长的主要原因是这样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⁴而持有第二种观点的有杨琥和崔志海等人。他们认为，蔡出任北大校长的原因是因为他想革新北大、改革教育、普及教育。在蔡元培身上，学者的气质远过于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质。再说，那时蔡元培与孙中山对于许多问题都有不同的立场和主张。因此蔡出任北大校长应该是由他本人做出决定的，而并非出于孙中山的授意。另，杨琥还表示，之所以许多人认为蔡出任北大是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或授意，是因为采用了罗家伦回忆录的说法。⁵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查阅了五四运动方面两本权威专著，即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和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发现它们并未提到蔡元培决定担任北大校长是否与孙中山有关。从史

⁴ 参阅萧超然等编. 1988. 《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萧超然. 1995.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平叔. 1986.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上）. 民国档案，（2）.，高平叔. 1986.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下）. 民国档案，（3）.，梁柱、王世儒. 1995.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⁵ 参阅杨琥. 2004.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 北京社会科学，（4）.，崔志海. 2006.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 史学月刊，（1）.

料考察，《蔡元培日记》⁶、《蔡元培书信集》⁷和《孙中山全集》⁸等几份重要材料中亦未提到此事。

而《蔡元培年谱》1916年12月中的内容却有一段话表示：“孙中山先生竭力主张往就此职，认为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元培先生也认为任大学校长并非做官，故决定北上。”

（高平叔，1980:36）高平叔先生在后面标注此条信息的资料来

⁶ 《蔡元培日记》分上、下两册，王世儒编，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日记始自1894年止于1940年，在时间跨度上历经四十七年。在这四十七年之中，实际记有日记的仅有三十一个年份，而且期间有的年份中，还有时断时续的情况。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前，日记记录的年份有1894年（6月至11月）、1895年（3月至4月）、1896年（正月至10月）、1897年（正月至12月）、1898年（正月至12月）、1899年（正月至12月）、1900年（正月至5月、8月至12月）、1901年（正月至12月）、1902年（正月至3月）、1906年（正月至12月）、1911年（1月至12月）、1913年（2月至12月）。之后，1914年至1917年6月都没有记录，到1917年7月以后才有记录。因此我们缺乏的是从1916年9月蔡元培收到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至1917年初蔡刚就任北大校长这段十分重要的日记。

⁷ 《蔡元培书信集》分上、下两册，高平叔、王世儒编注，200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在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前，共有十份蔡致孙中山的电报，即1912年2月28日致孙中山电、1912年3月1日致孙中山等电（两份同名）、1912年3月4日致孙中山等电、1912年3月6日致孙中山电、1912年3月7日复孙中山电、1912年3月9日致孙中山电、1912年3月9日复孙中山电、1912年3月13日致孙中山等电、1912年3月15日致孙中山等电。所有电报中商谈的都是关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事宜。而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复吴稚晖的信函中有提到蔡担任校长的决定。蔡在信中指出：“……弟前以北京大学问题，商于先生，先生谓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凡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实亦无不可办云云。弟到京后，与静生，步洲等讨论数次，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业于一月四日到校，九日开学。……”可见，蔡元培就担任校长一职曾与友人讨论过多次，但从未提到是出于孙中山的授意或指派，更没有与孙中山商讨过此事。

⁸ 《孙中山全集》共有十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在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前，仅有第二卷中的1912年3月7日孙复蔡元培等电是孙、蔡二人之间来往的信函。其内容也是关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事宜。

源为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罗家伦对蔡元培的回忆录原文如下：

“1916年底，蔡元培先生自己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本来在清季就不顾他翰林院编修清高的地位和很好的出路，而从事革命，加入同盟会。当时党内同志有两种意见，一种赞成他北上就职，一种不赞成。国父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所以主张他去。蔡先生自己又不承认做大学校长是做官，于是决定前往。”（罗家伦，1997:133-134）

杨琥（2004）表示，罗家伦是国民党史家，罗这样表述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孙中山争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因为如果能把蔡进北大论证为受孙支持或指派，孙中山领导了或指导了五四运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结论。可是，作者发现不仅是罗家伦，连共产党名人许德珩也陈述过类似的回忆。

许指出：“1916年9月初，蔡元培先生正在法国，接到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电，促归国任北大校长。蔡于当年12月回到上海，多数友人均劝他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怕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孙中山先生则竭力主张往就此职，认为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先生本人也认为任北大校长并非做官，故决定北上就职。”（许德珩，1987:19）

由此可见，杨琥的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有待进一步讨论。关于这段经历，蔡元培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回忆，但与罗和许的有点不同。他回忆说：“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明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2003:147）

综上所述，因为至今仍无任何一条史料能够论证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是得到孙中山支持或授意，所以蔡出长北大应该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尤其是他想以教育家的身份对腐败的北大进行彻底的改革。即使当时孙中山支持蔡去，影响也不会很大，甚至起不到什么作用。再说，当时蔡与孙的思想已经开始分歧，对许多问题都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这更能证明这一决定主要是由蔡元培本人做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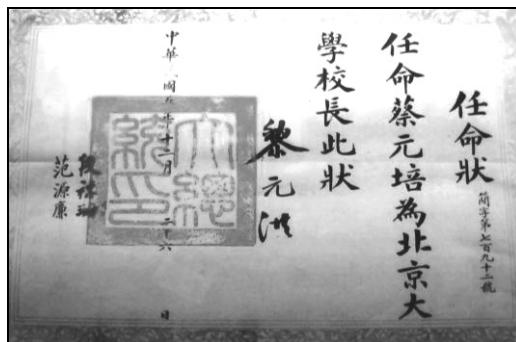


图3：蔡元培北大校长任命状
(图片来源：作者于2014年9月17日在蔡元培北京故居拍摄)

四、关于蔡元培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

关于蔡元培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学术界颇有不同的看法与争论。大体可分为认为蔡对五四持支持态度、反对态度以及既支持又反对态度等三派。认为蔡元培支持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有朱君、梁柱、李德明等人。⁹ 他们将蔡把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将在合约上签字的消息转告北大学生、蔡对 1919 年 5 月 3 日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大会表示赞同并对学生给予鼓励¹⁰，以及五四后蔡营救被捕学生等行为看做蔡元培支持此运动。而认为蔡反对五四的有张寄谦和高山。他们将五四那天蔡元培出来劝阻学生，以及事后蔡表示不赞同学生示威游行等行为理解为蔡反对五四。¹¹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蔡既支持又反对此运动。他们是黄崇法、魏授章和崔志海等人。他们指出，五四前后蔡元培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有变化，即事前支持，而事后却反对。¹²

⁹ 参阅朱君. 1988. 《简论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贡献》. 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梁柱. 《一代宗师铸名校》，收入梁柱 王世儒. 1995.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李德明. 1998. 《蔡元培对“五四”的积极贡献》. 天府新论，（5）.

¹⁰ 关于蔡元培对 5 月 3 日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大会的态度，周策纵（1999）另有看法，他指出那天晚上蔡对学生表示过“很同情”。原文如下：“5 月 3 日学生决定提前举行游行示威这件事显然早已为北大行政当局所预料到。学生集会以前蔡元培曾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生活动问题。因为军阀对大学采取敌对的态度，加上教授本身对政府在中日问题方面的懦弱立场感到愤怒不满，所以教授不愿意阻碍学生活动。‘五四’前夕蔡氏召见过领头的学生狄福鼎，据说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很同情。”（周策纵，1999:149）

¹¹ 张寄谦. 1979. 《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 北京大学学报，（3），高山. 1999. 《从北大改造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天山论坛，（1-2）.

¹² 黄崇法. 1985.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历史教学问题，（2），魏授章. 1989. 《试论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3），崔志海. 2006.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 史学月刊，（1）.

据作者收集到的史料，蔡元培把巴黎和会的消息转告北大学生这件事确实是真的。下面几条回忆录可以证明此事。叶景莘（1948）在《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一文中指出：“徐世昌政府设有外交委员会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长，叶景莘任事务员。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但五月三日，林长民获悉：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子民先生家。当晚，蔡先生召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于是爆发五四运动。”¹³

郑天挺（1948）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会上表示：“运动原定五月七日举行，后因知道事不宜迟，国际压力已来，于是提前了。这消息是蔡先生传来的。”¹⁴

另一个当事人许德珩（1979）也曾经回忆说：“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¹⁵

¹³ 转引自高平叔. 1980. 《蔡元培年谱》. 中华书局，第 48 页.

¹⁴ 转引自高平叔. 1980. 《蔡元培年谱》. 中华书局，第 48 页.

¹⁵ 转引自彭明. 1998. 《五四运动史》（修订本）. 人民出版社，第 265 页.

尽管具体情节略有出入，但蔡元培把巴黎和会的消息转告北大学生这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需要注意的是蔡元培本人的回忆录和书信集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不管是此事，还是众所周知的五四后蔡为被捕学生而奔走，作者认为蔡的这些行为都表示了他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态度。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蔡元培也是爱国主义者，因此他支持此运动是毫无疑问、理所当然的。否则，他不会主动告诉学生巴黎和会的消息，更不会奋不顾身地营救被捕学生。在 1919 年 5 月 10 日致北大同学函中，蔡元培表达了他对学生爱国热情的赞成。他在信中说：“……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高平叔、王世儒，2000：414）

至于有些研究者提到的五四当天蔡元培出来劝阻学生，当事人张国焘与蔡元培二人的回忆录讲的完全相反。

张国焘指出：“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张国焘，2004:48-49）

而蔡元培表示：“到八年 5 月 4 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蔡元培，2003:153）

可见，张国焘说蔡元培五四当天出来劝阻学生了，但蔡本人却说没有。因此，作者认为这个问题确实有待进一步讨论。下一个问题是有些研究者说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发生后对学生示威游行表示不赞同，甚至反对。作者查阅相关史料后发现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五四后蔡元培的许多讲话和回忆录中都能反映他的这种态度。最具有代表性的讲话是 1920 年 5 月所发表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

“……依我看来，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现在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付的，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打定主意，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蔡元培，2009:144）

由此可见，虽然五四前蔡元培对此运动的态度是支持的，但事后却完全相反，他很多时候表示不赞同，甚至反对学生示威游行活动。这看起来有点矛盾，可是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对某件事的态度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发展而变化。蔡元培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也如此，不断地变化，即事前支持，事后反对。支持五四是因为蔡元培是爱国主义者，他当然要支持它。而反对五四是因为他同时也是教育家和校长。他当然要提醒学生要专心学习、研究学问，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业上，不要让政治活动影响自己的学习。



图 4: 1919 年 5 月 4 日北大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图片来源: 周策纵. 1999. 《五四运动史》. 岳麓书社.)

五、关于蔡元培的辞职

关于蔡元培的辞职, 研究者们大多数认为蔡元培在营救被捕学生成功后的第二天就向徐世昌政府递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呈文, 主要是因为在受到北洋政府的压力的背景之下, 蔡以自己的去职来换取保全北大学生和学校免遭当局的迫害。研究者们对蔡此举动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此问题进行过不同的分析。如张寄谦 (1979) 指出, 蔡元培辞职是他不对恶势力 (即北洋政府) 妥协的一种表现。尹小未 (1996) 表示, 蔡辞职出京是他对当局的一种消极抵抗。而王昊 (2001) 分析指出, 蔡元培的辞职有警告学生的意味。

在已有研究与史料结合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蔡元培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天决定辞职是出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为了保护北大和学生的安全应该是他的最主要原因。1919年5月17日天津《益世报》登载的蔡元培在天津车站与友人谈话的记述和他后来的回忆录是可以论证此事的重要材料。¹⁶ 至于蔡元培借此举动表达他对北洋政府的不满，甚至是一种象征性的反抗的表现，以及警告学生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作者认为这两个是有可能的，但应该是次要的原因。

在以辞职作为反抗政府的表现上，五四运动前蔡元培曾经做过两次。1912年7月14日，因不满于袁世凯独裁专制，蔡元培决定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接着，1917年7月2日，蔡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以表示他对张勋复辟的抵抗。在以辞职为警告学生的手段方面，1918年夏天，北大学生踊跃参加反日运动。他们结队游行，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向总统府去请愿。当学生

¹⁶ 1919年5月17日天津《益世报》登载的蔡元培在天津车站与友人谈话的记述，摘录如下：“蔡子民南下等车时，遇一天津友人，询以辞职何以如此坚决？蔡曰：‘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一位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力，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子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转引自高平叔. 1980. 《蔡元培年谱》. 中华书局，第49页. 另，蔡元培本人的回忆录也说明了他决定辞职是为了不要增加学生对政府的纠纷。“……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作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5月9日。”（蔡元培，2003：153）

正要出发时，蔡校长已出来劝阻他们，可是他们不听。蔡因此引咎辞职。¹⁷



图 5：北大校长蔡元培办公室

（图片来源：作者于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拍摄）

¹⁷ 关于此事，蔡元培做过这样的回忆记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

（蔡元培，2003：153）罗家伦对当时的经过陈述如下：“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两个留日学生的代表，其中一个叫阮湘，在北大西斋饭厅慷慨激昂的在演说，大家莫不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最后我跑上讲堂对着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来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这句话出来以后，大家受了一个极大的刺激，当场表决，第二天去闯新华门。到了那时候，果然北大学生还同其他几校的学生，集合在新华门口，一直围到下午五点多钟大家才散。哪知道回来以后，蔡先生提出辞呈。”（罗家伦，1990）

六、结语

总的来说，近几十年来的蔡元培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研究的面几乎无不涉及。同时，研究者们也注意挖掘新的有关蔡元培的原始史料。就学术界尚存在着的一些争议，尤其是蔡出任北大校长、蔡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以及关于五四后蔡的辞职等三个问题，不少研究者试图从别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作者在本文中也尽可能运用更多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解答问题。但因为作者本人能力有限，本文难以避免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欢迎各位同仁批评指教。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的史料非常之多，浩如烟海。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来说既是无穷的财富也是很大的挑战。虽然现在有关蔡元培的原始史料已经大量出版，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挖掘更多的新史料，以为学术界创造新意。另，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周围的友人大多数是中国当时各界的名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值得研究。若能从蔡元培友人的角度来研究蔡元培本人，就可能为学术界打开蔡元培研究的新视野。再者，以往的研究方法有的比较单一。想创新，有时要大胆试用新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也是一种选择。有比较，才有鉴别。将蔡元培与时人进行比较研究，可能会发现出新问题来。因此，“新史料”、“新视野”和“新方法”才是使该研究不断向前迈进，成果更加完善的主要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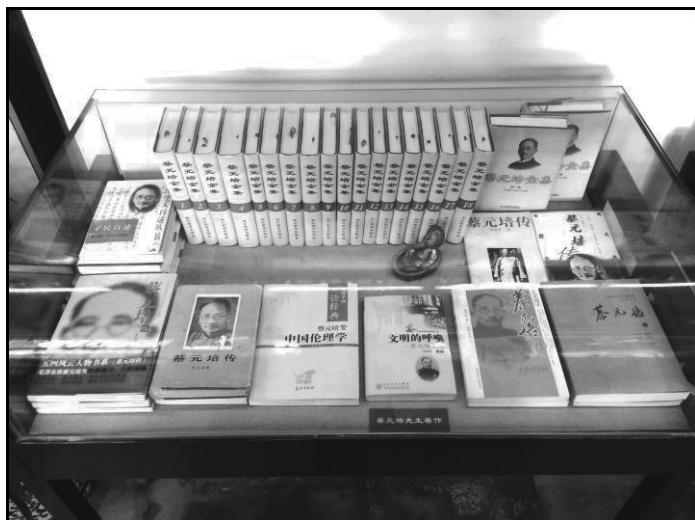


图 6：有关蔡元培研究的部分著作与史料

（图片来源：作者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在蔡元培北京故居拍摄）

参考文献：

史料

蔡元培. 2003.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湖北人民出版社.

蔡元培. 2009.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 岳麓书社.

曹汝霖. 2009. 《一生之回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高平叔. 1980. 《蔡元培年谱》. 中华书局.

高平叔. 1984.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中华书局.

高平叔. 1999. 《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平叔、王世儒. 2000. 《蔡元培书信集》（上）. 浙江教育出版社.

刘维开. 1996. 《罗家伦先生年谱》. 国民党党史会出版.

罗家伦. 1997. 《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 学林出版社.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 1976. 《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一册）. 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 1988. 《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五册上）. 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王世儒. 2010. 《蔡元培日记》（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许德珩. 1987. 《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

张国焘. 2004. 《我的回忆》（上）. 东方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2013. 《五四运动回忆录》. 知识产权出版社.

著作

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 1999. 《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 1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梁柱、王世儒. 1995.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彭明. 1998. 《五四运动史》(修订本). 人民出版社.

汤一介. 2010.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萧超然. 1995.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

萧超然. 2005. 《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萧超然等. 1988. 《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 (增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扬. 1997. 《蔡元培》. 上海三联书店.

周策纵. 1999. 《五四运动史》. 岳麓书社.

期刊论文

蔡慧琴. 1999. 《试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 (2) .

陈平原. 2004. 《蔡元培与老北大》. 领导文萃, (2) .

楚保玲. 1997.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 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 (5) .

崔志海. 2006.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 史学月刊, (1) .

董宝良. 2005. 《蔡元培整顿与改革北京大学的历史经验》.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1 (3) .

杜瑛. 2002. 《试论大学校长宽容角色的现实意义——蔡元培成功领导北京大学的启示》. 现代教育科学, (9) .

傅斯年. 2013.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博览群书, (6) .

高平叔. 1986.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上). 民国档案, (2) .

高平叔. 1986.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下). 民国档案, (3) .

高平叔. 1998.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

高山. 1999. 《从北大改造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天山论坛（1-2）.

胡志坚. 2006. 《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心理史学研究》. 大学教育科学，（5）.

黄崇法. 1985.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历史教学问题，（2）.

李德明. 1998. 《蔡元培对“五四”的积极贡献》. 天府新论，（5）.

梁柱. 1998. 《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 文史精华，（2）.

刘锋. 2003. 《蔡元培北大改革成功原因剖析》.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3（2）.

陆米强. 1999.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上海党史研究，（2）.

罗家伦. 1990.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选刊）. 鲁迅研究月刊，（5）.

马句. 1999. 《缅怀五四运动的奠基人蔡元培先生》. 新视野，（3）.

苗体君. 1999.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新探》. 广东社会科学，（3）.

欧阳哲生. 1996.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学报，（5）.

彭明. 1989.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蔡元培》. 高校社会科学，（2）.

苏爱荣. 2001. 《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广东党史，（3）.

孙颖. 2006. 《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与大学人事改革》.

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8).

屠文淑. 1989. 《五四运动的先导蔡元培先生》.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王冬燕. 1995. 《蔡元培北京大学改革成功经验之启迪》. 黑龙江
高教研究, (6).

王昊. 2001. 《蔡元培“五四辞职”探微》.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王志彦、徐焕文. 2006. 《探析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成功的原
因》.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 (9).

未君. 1988. 《简论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贡献》. 绍兴师专学
报(社会科学版), (1).

魏授章. 1989. 《试论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3).

文庠. 1999.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党史纵览, (2).

杨琥. 2004.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 北京社会科
学, (4).

殷小未. 1996. 《五四运动蔡元培辞职出京》. 历史教学, (6).

张寄谦. 1979. 《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 北京大学学报, (3).

张晓唯. 2005.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书屋, (6).

周天度. 1986. 《关于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界的一项决议案——兼评
蔡元培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近代史研究, (1).

ABSTRACT

Questions about the Study of Cai Yuanpei and Peking Univers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Revision Based on 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Kampol Piyasirikul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research works relating to Cai Yuanpei and Peking Univers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owever, the academic world ha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wards these works and divides them into the three following issues: 1) Cai Yuanpei's service as th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2) Cai Yuanpei's attitudes towar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3) Cai Yuanpei's resignation. In the past, the writer studied, summarized the mentioned three issues, and published an article without using any 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analyze th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udy of Cai Yuanpei and to clarify those three issues, the writer has re-analyzed them based on relevant 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sequently, basing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the writer has raised some new viewpoints to make this

current research ahead of others and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perfection.

Keywords: *Cai Yuanpei, Peking Universit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s*